

文澜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残卷之文献价值

崔 富 章

文澜阁《钦定四库全书》内含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一百二十五册,包背装,开花纸红格写本,每半叶九行,行二十一字,白口,左右双边,钤“古稀天子之宝”(阴文)、“乾隆御览之宝”,与其他库书无异。所不同者,一百二十五册之书,不集中一体存放,而是解体为四(依经、史、子、集划分),其绢面分色调为绿、红、蓝、灰,签题“钦定四库全书”,其下小字双行题“×部 总目卷×”,各自置入《四库全书》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之首。嘉庆二十五年(1820),杭州承办盐商吴恒聚等造送《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》五本,对上述特征,有详确之记录。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三年间(1861~1864),太平军进驻杭城,阁书散佚,战后归阁,不足三成。《总目》仅存十一册,不足一成,合并解放后收回的四册,计残存十五册二十七卷(卷六四、六五、六九、七〇、七一、七八、七九、八〇、一二五、一四〇、一四八至一五三、一五六、一五七、一六二至一六五、一八三、一八五、一八六、一九五、一九六)。每册皆钤御宝,首叶钤“古稀天子之宝”(阴文),尾叶钤“乾隆御览之宝”,与《清册》所载相符,世称“原抄本”,以与光绪八年(1882)后由丁丙主持缮写的“补抄本”相区别。原抄本残卷虽少,意义却不容小觑。近百年来,学术界漠视它的存在,“浙本翻刻殿本”误说才得以发生并流行,众多的研究者被引入歧途,事倍功半,甚或劳而无功,徒增淆乱而已。

所谓“浙本”，就是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杭州刊成的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二百卷首一卷。当时刚刚到任的浙江学政阮元有《跋》恭纪其盛：“四库卷帙繁多，嗜古者未及遍览，而《提要》一书，实备载时、地、姓名及作书大旨，承学之士，抄录尤勤，毫楮丛集，求者不给。乾隆五十九年，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谢启昆、署按察使司臣秦瀛、都转盐运使司臣阿林保，请于巡抚兼署盐政臣吉庆，恭发文澜阁藏本，校刊以惠士人。贡生沈青、生员沈凤楼等，咸愿输资，鸠工葺事，以广流传。六十年，工竣。学政臣阮元本奉命直文渊阁事……兹复奉命视学两浙，得仰瞻文澜阁于杭州之西湖，而是书适刊成。士林传播，家有一编，由此得以津逮全书，广所未见，文治涵濡，欢腾海宇，宁有既欤！”考阮元于乾隆六十年“十一月初一日至杭州，初六日接印”^①，浙本刊竣的时间应不晚于乾隆六十年十月。刊刻依据的底本，谢启昆等“恭发”的“文澜阁藏本”，正是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内的原抄本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一百二十五册。我们拿残存的二十七卷与刻本对校，无不吻合，甚至残卷中的讹误文字，刻本亦照原样不改。如卷六十九单镌《吴中水利书》提要“书中有‘并图以进’之语，载于其上加帖黄云：其图画得草略，未敢进上”，“载”为“而”之误；卷七十八《日本考》提要“明李言恭、都杰同撰”，“都”为“郝”之讹；卷七十九《钦定历代职官表》提要“迨秦汉内设九卿，外制列郡，而官制一变”，“制”为“置”之误；卷一百六十三《覆斋遗集》提要“又有務畜人才疏”，“務”为“豫”之讹；卷一百六十四《耻堂存稿》提要“历官端明阁学士”，“阁”为“殿”之误；又“端平间知彳丐州”，“彳丐”为“沔”之讹；卷一百六十五《四明文献集》提要“盖据拾残賸，非其真矣”，“真”为“舊”之误；《晞发集》提要“而节概亦卓然可观”，“观”为“传”之误，以上八处明显的讹误，刻本皆一一沿袭之。借用生物工程的新名词，可以说浙本与文澜阁原抄本“基因”吻合，亲子关系成立。

所谓“殿本”，就是乾隆六十年十一月由武英殿刊成的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二百卷首四卷。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，原户部尚

书、办理四库全书副总裁曹文埴谨奏:“臣于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仰蒙俞允,并缮写式样,呈览在案。续因纪昀等奉旨查办四阁之书,其中《提要》有须更改之处,是以停工未刻。今经纪昀将底本校勘完竣,随加紧刊刻毕工。谨刷印装潢陈设书二十部,备赏书八十部,每部计十六函,共一千六百函,恭呈御览。其版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块,现交武英殿收贮。再,纪昀曾知会臣于书刊成之日,刷印四部,分贮四阁,兹一并印就,请飭交武英殿总裁照式装潢,送四阁分贮。”^②作为武英殿刊刻《总目》的责任人,曹文埴的奏折告诉我们:殿本《总目》刊竣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,略迟于浙本;刷印一百零四部(印本“琰”字缺笔,避嘉庆皇帝名讳),未颁发南三阁;殿本的底本,是纪昀“校勘完竣”之本。所谓“校勘完竣”之本,就是在乾隆五十七年五月第二次复校北四阁库书完工之后,纪昀须对《总目》作相应修改,仔细磨勘,一直到乾隆逊位(乾隆六十年九月)前夕的修订稿本。这个稿本不知飘落何所。国家图书馆收藏六十三卷(卷一、二、四、五、九、一五、一七至二十二、二十五、二十九、三十八至四十一、四十五至四十七、五十一、五十二、五十六至七十三、七十六、一一七、一二六至一二九、一四一、一四二、一五〇、一五六至一五九、一六五、一六六、一七三、一七五至一七七、一八六、一八七、一九七),行间多修改笔迹,如卷一百六十五《四明文献集》提要“盖据拾残贖,非其真矣”,改“真”为“旧”;《晞发集》提要“而节概亦卓然可观”,改“观”为“传”。底本与文澜阁原抄本一致,修改部分则与武英殿刊本吻合。这六十三卷,实为殿刊底本的残卷,就是纪昀“校勘完竣”之本的一部分。前举文澜阁残卷六十九、七十八、一百六十三、一百六十五等四卷中的八处讹误,武英殿刊本已经全部修正。据此测算,纪昀“校勘完竣”之本,修订当在四百处以上,且不限于一般的文字讹误,内容的补正增删,亦不在少数。如卷五十五《周忠愍奏疏》提要,浙本“明末积习,好以讹訐取名,其奏议大抵客气浮词,无裨实用。起元诸疏,尚多有关国计民

生，非虚矜气节者比，其人其言，足垂不朽，今录其《奏疏》二卷”一段，殿本修改为：“当魏忠贤肆虐之日，国事日非，几几乎毒焰熏天，狂澜汨地，无耻者从风而靡，代为搏噬，无论矣；即皦然自好者，亦洁身去之而已。起元独与杨、左诸人奋起而婴其锋，虽率至白骨衔冤，黄泉茹痛，而士大夫尚赖此数十君子知世间有廉耻事，亦不可谓非中流之砥柱也。其人足重，斯其言可传，岂明末台谏连篇累牍，徒以诤讦取名者所可同日语哉！录而存之，以表彰忠义之气也。”由五十七字扩充至一百四十七字，大气磅礴，酣畅淋漓，是深入体会乾隆“殷鉴不远，尤当引为炯戒”指示精神，且与乾隆帝晚年著力表彰忠义、惩治贰臣的政治氛围息息相通的杰作。

浙本与殿本，浙本在前，殿本在后。前者以颁发文澜阁的写本（原抄本）为底本，后者以乾隆六十年纪昀“校勘完竣”之稿本为底本。浙本、殿本，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，总体而论，殿本略占优势。影响殿本优势的因素有二：一是《总目》从初稿到文澜阁写本，历经近十年的修订删补，其成果未被纪昀手头的“校勘完竣”之本全部吸收（原因不明）。二是乾隆六十年九月逊位，同年十一月十六日曹文植奏折称“今经纪昀将底本校勘完竣，随加紧刊刻毕工”，时间紧迫，主校神散，讹误增多，底本的优势被打了折扣。仔细推究，具体分析，两本的异同优劣是说得清楚的。但是，自从“浙本翻刻殿本”误说流行之后，则一切都乱了套。

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，广雅书局翻刻殿本《总目》，增入《武英殿聚珍版书》中。主持校刻的傅以礼《跋》云：“是编于乾隆四十七年告成，由武英殿排印通行，即此聚珍本也。浙江据以重刻，亦应无不吻合。乃所载不尽相符，或此有而彼遗，或彼存而此阙，而卷数之多寡，字句之详略，更无论已。此本系就丰顺丁氏所藏聚珍原印本重钺，以补闽刻所未备。曾偕孙鹺尹星华，拟共荟萃细绎，牖叙异同，为校勘记。以兹事体大，未容草草卒业，谨先据浙本增入《谕旨》一道，乃乾隆五十五年所颁者，此本印行在先，自不及载，惟《表》尾偶

缺诸臣职名,并依浙本补鐫,即此亦足为各本互异之一证焉。”大兴傅以礼为版本目录学名家,此《跋》却讹误连篇:殿本《总目》乃乾隆六十年武英殿刊版刷印本,并无“武英殿排印通行”的“聚珍本”,傅氏把翻刻底本即“丰顺丁氏所藏”的武英殿刻本误认成“聚珍原印本”了。其实,乾隆中辑印《武英殿聚珍版书》一百三十八种(刻本四种,木活字排印一百三十四种),其中并无《总目》,至光绪二十年(1894)始由福建书局据殿本重刻,增入该局翻刻的《武英殿聚珍版书》中,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广雅书局继之。排除层层迷雾,傅氏的观点可径直表述为:浙本据殿本重刻。然而,两本内容竟是如此的“不尽相符”,又难以用“手民之误”来解释,傅氏感到困惑,于是“荟萃细绎,牖叙异同,为校勘记”,而不强作解人。傅以礼之后,学者们则没有这份耐心了,在他们的笔下,“浙本翻刻殿本”是天生合理的,不容置疑的。如洪业《四库全书总目引得·序》^③、郭伯恭《四库全书纂修考》^④、王重民《论四库全书总目》^⑤、《跋影印本〈四库全书总目〉》^⑥、中华书局影印浙本《出版说明》^⑦、昌彼得《影印〈四库全书〉的意义》^⑧、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殿本《弁言》^⑨、华立《四库全书纵横谈》^⑩、长沙市中山图书公司“四库全书研究所”之《整理凡例》^⑪、海南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委会”之《整理说明》^⑫等等,皆力主“浙本翻刻殿本”说,异口同声,除王重民教授一人之外,不再询问证据,遂成通行之成说。文澜阁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原抄本残卷,一直静静地躺在西湖孤山的书库里,隐居独处,听凭外面的世界海阔天空,游谈无根。

其实,抛开文澜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残卷不谈,“浙本翻刻殿本”论自身亦不能成立。始作俑者傅以礼,并未举出有力证据。洪业以下各家,大抵不问证据。唯有王重民教授一人,苦苦求索,力图论证“浙本翻刻殿本”的合理性。他的著眼点,一是将浙江学政阮元《浙江刻四库全书提要跋》一文中的“恭发文澜阁藏本,校刊以惠士人”,修改为“文澜阁所藏的殿刊本”,二是把浙本与殿本的诸多不

同归结为“有一些地方的确是刻错、刻脱的字，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是在翻刻过程中经过校刻人有意识改动的。”^⑬。如前所述，武英殿刊刻《总目》，虽然启动较早，却因故“停工未刻”，直到乾隆六十年底才“加紧刊刻毕工”，时间上稍晚于浙本，且并未颁发南三阁，所以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吴恒聚造送的《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》中不见著录。王先生为改动浙刻本原始文献而作的种种推测，如“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由武英殿刻成大概是在乾隆五十八年秋冬之间，最晚不过这一年的冬季。大概乾隆五十八年冬或五十九年春殿本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才送到了杭州文澜阁，浙江地方大吏和浙江士绅就在五十九年开始了校正翻印的工作。”^⑭这些推断，统统不能成立。浙刻本的确存在一些讹误，全部归咎于“刻错、刻脱”则不公平。如前所举，有相当数量的错讹是源自底本——文澜阁原抄本《总目》，校刻人不敢轻改而沿误。至于说浙江“校刻人有意识改动”，甚至说“最可笑者是浙本校刻人，不看提要内所记子卷数目，硬改总卷数，这是末流考据家不读书不动脑筋的普通毛病”^⑮，这些话皆非求真务实之论。当年浙江士绅翻刻《总目》是极严肃的事，既是学术问题，又是政治问题，机遇与风险并存，只有谨遵“钦定”且钤有“乾隆御览之宝”的底本，才是最安全的。让我们举例以明之。文澜阁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残卷卷六十四《礼白岳记》提要：“明李日华撰。日华有《梅虚先生别录》，已著录。是书自纪其万历庚戌礼神白岳之事。卷末又题曰《篷枕夜话》，殆是书有二名耶？《因树屋书影》曰‘尝见樵李李君实所为《礼白岳记》，分视之各为一则，合视之共为一记，而诗即连缀于中，分视之则诗，合视之诗亦记也。诗文照映，使山水神情无所遁于其间，真是合作。今人为游记者，意在谋篇，终难逐境。章法故自贯串，境地终未分明。且记自记，诗自诗，使读者因记以忆诗，持诗以寻记，笔墨间隔，神情不属，不数行欠伸欲卧矣。故予以为李公之记，可为今人法也’云云，其推挹甚至。然终不出万历后纤巧之格，所谓才士之文，非作者之文也。”浙江翻刻

本文字完全相同。殿本则作:“明李日华撰。日华有《梅虚先生别录》,已著录。是书自纪其万历庚戌礼神白岳之事,卷末又题《篷枕夜话》,殆是书有二名耶?”短短四十七字,不及浙本四分之一。纪昀最终删掉原引《因树屋书影》一段,是有背景的。乾隆五十二年(1787)三月、八月,乾隆帝两次抽阅《四库全书》,都发现有“违碍”书籍,下令将李清、周亮工的著作“掣出销毁,其《总目》提要亦著一体查删”^⑥。由此引发对北四阁《全书》的全面清查、重校。续缮南三阁三份全书,除乾隆五十一年九月首批发文宗(或文汇)文澜各一百十种、二千零二十四册外,余十万二千零五十册留置武英殿,组织清查重校,历经三年,至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告竣,送武英殿提调钤用御宝,正式颁发。周亮工《书影》已经从《全书》中掣出,其《提要》亦从《总目》中删除,而明人李日华《礼白岳记》一书之《提要》所引的一段,则侥幸漏网。漏网者不止一处,卷一百二十三《七颂堂识小录》提要“惟苏轼所书《醉翁亭记》,《因树屋书影》以为出中州士人白麟之手,高拱误为真迹,勒之于石”一段,殿本删去“因树屋书影以为”七字。如果“浙本翻刻殿本”之说成立,那就等于说浙江校刻人在《礼白岳记》提要中故意增引周亮工《书影》的长篇大论,在《七颂堂识小录》提要中有意增写“因树屋书影以为”七字。自作主张,征引禁毁之书,岂不是自招杀身之祸?主持校刻的浙江按察使秦瀛,曾任四库馆缮书处分校官,累计记过三十六次。领衔的浙江布政使谢启昆,曾在扬州知府任内因《一柱楼诗》案被革职(乾隆四十三年九月),一之为甚,其可再乎?

王重民教授《论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跋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》两篇宏论,从《总目》的纂修背景、纂修过程、著录原则、思想内容到日后的影响,作了系统的、深刻的阐述,不乏卓越的见解,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只是作为“浙本翻刻殿本”论的主将,他的论证方法,有点类似于“增字解经”,本不足取;“有意识改动”之说,又明显缺乏公信力。所谓“浙本翻刻殿本”论之不能自圆其说,应是无可争辩的事

实。可是,这一源自傅以礼“想当然”的误说,竟传诵百年之久,并世学者,咸受其累。《出版说明》愈说愈不明,反而引出浙本“校正了殿本的不少错误”之悖论。“整理本”亦受其拖累,甚或改易重编,乱上添乱。在清理“浙本据殿本重刻”误说的来龙去脉之后,笔者并不感到轻松。如果文澜阁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原抄本全毁于兵燹,如果幸存的残卷一如既往地漠视,如果整理出版者依旧习非为是,以讹传讹,且愈传愈像,例如引用王重民论述时删掉“大概”二字,甚或隐去主名,造成本真如此、无需论证的假象,自欺欺人,那么,虚拟的“浙本翻刻殿本”论,不仅会“跨世纪”,说不准还能再传递一百年呢!

注:

①参阅张鉴《雷圻庵主弟子记》卷一。

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第1292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。

③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排印本,1931年。

④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出版,商务印书馆发行,1937年。

⑤《北京大学学报》,1964年第2期。

⑥《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》,1981年第1期。

⑦1964年。

⑧台北《故宫季刊》17卷2期,1982年。

⑨1983年。

⑩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年。

⑪中华书局排印殿本整理本,1997年。

⑫海南出版社排印浙本整理本,1999年。

⑬⑭⑮《跋影印本〈四库全书总目〉》。

⑯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第1992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